

阶级启蒙：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 对工人的政治动员及影响（1920—1921）*

张仰亮

提 要：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通过安排早期党员入厂做工，先后成立了机器工会等拥有群众基础的阶级工会。同时，出版直接面向工人的《劳动界》等通俗读物，创办工人业余补习学校，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领导工人集会，声援工人罢工，以此反抗资本家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通过对工人的政治动员，使工人的劳动知识和阶级觉悟有所提高，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积累了一定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营造了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由于自身力量弱小，组织涣散，经验缺乏，且面临租界、华界和传统势力的多方压制，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对工人的动员更多停留在有限的组织建设和宣传教育层面上，并没有真正领导工人开展罢工实践，尚处于阶级启蒙阶段。

关键词：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 上海工人 政治动员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工人聚集地。^①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以下简称“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后将组织动员工人视为其开展革命的基本任务。^② 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了群众性阶级工会，创办了通俗性工人读物，举办了工人半日学校，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积累了一定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营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学界对中共上海早期组织领导工人运动问题已有不少研究，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劳动界》以及陈独秀、李中、李启汉、俞秀松、上海机器工会等，详细论述他们与上海工人运动的关联。^③ 但学界较少从宏观层面对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之于工人的动员机制问题进行论述，对建党前夕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与工人进行结合这一问题尚有语焉不详的地方。本文拟对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工人动员进行史实梳理，探究其动员工人的主要机制及运作实态，并对其动员工人的历史影响和困境做一剖析，为推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尽绵薄之力。

*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基层组织研究（1921—1927）”（项目编号：2020M671053）的阶段性成果。

- ① 参见《中共上海党史》编委会编：《中共上海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页。
- ② 参见张仰亮：《建党初期中共对上海工人的动员机制及其成效（1921—1923）》，《苏区研究》2020年第6期。
- ③ 据笔者管见所及，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篇，分别是邵雍：《俞秀松与上海工人运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朱英、巴杰：《〈上海伙友〉论述——兼及店员之生存状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2期；杨宏雨、吴昀潇：《建党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劳动观——以〈劳动界〉为中心的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曾长秋：《李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产业工人党员和工运领袖》，《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李永春、孙欢：《李中与中共创建时期的工人运动》，《中共创建史研究》2018年第2辑；杨丽萍：《中共“一大”前俞秀松社会改造的思想和实践》，《思想政治课研究》2020年第1期；陈彩琴：《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与〈上海伙友〉周刊》，《上海党史与党建》2020年第9期；杨阳：《中共一大代表与共产国际代表关系之研究——以张国焘、李汉俊与马林的三者互动为对象》，《苏区研究》2020年第1期。

一 成立群众性阶级工会

1920年8月，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后开始了组建工会的筹备工作，早期党员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920年10月23日，陈独秀提出，外国的劳动者都有周末可以休息，每天只工作8个小时，每月却拿着一百数十元的工钱，各产业工人组织了自己的工会，而中国工人却没有这些待遇或权利。^①在陈独秀看来，要有效改善工人的悲惨境遇，首先要把工人组织起来，成立群众性的阶级工会。同年11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宣言》被上海早期党员起草出来，其中指出：现在应该成立若干大的产业组合，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一个“产业组合的总联合会”^②。不仅陈独秀为成立阶级工会问题奔走呼号，其他早期中共党员也有类似的主张。李达虽然对通过工人运动进行社会革命的道路持谨慎态度，但他也认为现阶段应先成立工会。12月7日，李达提出：我们即使不能完全依靠工人运动进行社会革命，但为增加阶级斗争的速度起见，劳动界不能不成立一种团体以与资本家相对抗，所以工会要从速成立。^③在早期党员看来，成立群众性的阶级工会是领导工人运动、开展社会革命的重要前提。

问题是，早期党员是通过何种渠道成立工会的呢？由于早期党员多是从事教师、新闻记者、编辑等职业的知识分子，有的还只是在校学生，与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工人群体交往甚少，对成立工会一事比较隔膜。在此情况下，早期党员进行了探索，他们逐渐认识到要派得力同志深入到工人中间活动才能奏效。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在给好友毛泽东的信中提到，要安排一些人到工厂中“去做工，办事”^④。蔡和森的这一想法在党内产生了共鸣，施存统同样认为“我们要干劳动运动，必须我们自己亲身跑到劳动者群里去。我们跑到劳动者群里去，然后才能好着手组织工会等团体”^⑤。这样，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开始动员一些早期党员深入到工人中间开展活动。^⑥在工厂内安排或培养共产主义者成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接近工人、团结工人乃至成立工会的重要途径。俞秀松、李启汉、李中等一批知识分子开始脱下长衫，换上短衫，“深入到工厂做社会调查”^⑦。机器工人是上海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数较多，且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受到早期党员的格外重视。

以上海机器工会为例。1920年8月，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开始筹划在杨树浦成立一个由机器

① 参见陈独秀：《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1920年10月23日），《陈独秀文集》第2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5页。

② 《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0月），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页。

③ 参见李达：《社会革命底商榷》（1920年12月7日），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1册，第182—183页。

④ 《蔡林彬给毛泽东：社会主义讨论，主张无产阶级专政》（1920年8月13日），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1册，第131页。

⑤ 施存统：《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1921年5月16日），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1册，第282页。

⑥ 参见《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1971年），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2册，第138页。

⑦ 陈秀萍：《俞秀松评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44—45页。

工人组成的工会组织，具体由李中负责发起筹建。^①李中，原名李声澥，湖南省湘乡人，1913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湖南一师），其间与同校的毛泽东等人过往甚密，1918年6月毕业后曾短时间留在湖南一师附小任教。1919年初，李中辞去教职来到上海谋生，在一家古董古玩店做帮工。由于李中经常翻阅《新青年》，思想进步较快，他时常到《新青年》杂志社向陈独秀请教问题，其间结识了李达、李汉俊等人。^②同年8月，李中加入新成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稍后又加入政治色彩更浓的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在陈独秀的鼓励下，李中辞去古董古玩店的工作来到海军造船厂（即之后的江南造船厂）做锻工，他通过同乡、知心工友等关系迅速联络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工人。^③9月，李中、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备机器工会，甚至草拟了较为完备的机器工会章程。^④11月26日，毛泽东在给罗荣熙的信中提到：李中在上海的江南造船厂做工人，并协助陈独秀等人组建了机器工会。^⑤

筹建上海机器工会的另一重要人物是杨树浦路电灯厂工人陈文焕。关于陈文焕的个人信息很少，但从有限史料中可知陈文焕思想比较进步且与陈独秀有过书信联系。9月3日陈文焕给陈独秀的信中表达了其本人对《劳动界》和陈独秀的敬仰之情。^⑥此外，陈文焕是一名有些文化的工人，曾在报刊上发表过进步文章。9月前后，李中无意间看到陈文焕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后，立即写信给陈文焕交换意见，两人相互通信后，相约在杨树浦电灯厂见面，并决定共同发起成立机器工会，之后厚生铁厂的工人也相继加入。^⑦

9月26日，李中以一名工人（海军造船厂锻工）的身份在《劳动界》发表了《一个工人的宣言》，呼吁少数同行业工人联络更多同行业工人组成一个大的工人团体，最后组成世界性的工会组织。^⑧10月3日，李中、陈文焕等人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召开上海机器工会的发起大会，由李中担任临时主席，各工厂代表80人到会。上海机器工会一再强调其与以往工会有很大不同，原因在于上海机器工会不是被资本家、政客、流氓把控的招牌工会，也不是同乡会，而是由真正机器工人参加的工会组织。^⑨早期党员陈独秀、李启汉、杨明斋、李汉俊等人以“参观者”的名义出席了此次大会，并被大会聘为“名誉会员”。^⑩杨明斋在会上详细阐述了成立机器工会的初衷，即减轻自己的痛苦和救济自己的生活。陈独秀在会上发表演说，他指出，矿工、铁路工、机器工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工会团体，要把以上3个工会联合

① 参见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2册，第8页。

② 参见曾长秋：《李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产业工人党员和工运领袖》，《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③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综述》，《共产主义小组》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39页。

④ 参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6页。

⑤ 参见《毛泽东给罗荣熙的信》（1920年11月26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2页。

⑥ 参见《通信》，《劳动界》第12册，1920年10月31日，第15页。

⑦ 参见《机器工会聚餐会盛况》，《民国日报》（上海）1920年12月14日，第10版。

⑧ 参见李中：《一个工人的宣言》，《劳动界》第7册，1920年9月26日，第4、5页。

⑨ 参见《本埠机器工会开会记（节录）》，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110页。

⑩ 参见《本埠机器工会开会记（节录）》，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110页。

起来，成立上海机器工会“算得是一个很好的事”。^①这次大会通过了陈独秀、李中等人拟定的《上海机器工会简章》。^②会议决定在领导机构正式成立前暂设以陈独秀为主任的经募处，陈文焕、李中等人为办事员。^③陈独秀等早期党员并非工人出身，但他作为社会名流可以通过“名誉会员”的身份参与到上海机器工会的各项事务中，也从侧面证明了早期党员对机器工会影响较深。

及至11月21日15时，上海机器工会^④在白克路207号（今凤阳路186号）^⑤隆重举行成立大会，出席者近千人，孙中山、陈独秀、杨明斋等人到会祝贺并讲话。陈独秀发表演讲指出，工人团体不能容纳资本家，否则容易演变成由资本家控制的“假工会”。^⑥上海机器工会的成立得到不少机器工人的支持，新加入上海机器工会的工人黄雄称，“它的宗旨、目的洽与我们现在要求的相合，真是好极了”^⑦。这时上海机器工会拥有会员370余人，李中任主席，陈文焕任理事长，出版了工会机关刊物《机器工人》。^⑧从上海机器工会的成立过程可以发现，该工会的主要组织者李中、陈文焕深受陈独秀的感召和影响，且《上海机器工会章程》是由陈独秀等人拟定，体现了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政治意志。上海机器工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第一个群众性阶级工会。^⑨

1920年12月间，早期党员还以类似的方式成立上海印刷工会，其章程和上海机器工会基本相同，会员1300余人，曾创办会刊《友世画报》，该报被称为“是真正工人底出版品”。^⑩《共产党》月刊曾评价上述两个工会为“办理得有精神有色彩的工会”。^⑪1921年1月，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专门的工会指导机关——职工运动委员会，由俞秀松、李启汉具体负责。^⑫早期党员还曾在纺织工人中间活动。包惠僧回忆：“最初的工作是参加印刷工人、烟草工人、纺织工人的

① 参见《上海机器工会开发起会纪略》（节录），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116—117页。

② 其宗旨主要分为三点：第一是用集体的理想，提高工人的道德和知识水平，促进阶级互助观念的形成；第二是用集体的力量，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改善工人的生活，减轻工人的痛苦；第三是发展相互扶助的公共事业。该会的活动内容包括设立职业介绍所、失业工人住所等工人公益机构；成立球房、浴室、茶食店、音乐室等工人休闲娱乐机关；成立补习学校、书报室等教育机关。此外，上海机器工会还会对工人提供法律咨询、伤残救恤等。参见《上海机器工会简章》，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111—112页。

③ 参见《机器工会开会纪事》，《申报》1920年10月6日，第11版。

④ 上海机器工会临时会所位于原西门路泰康里41号（后自忠路225号，今已拆除），是一幢坐南朝北砖木结构的两层沿街住宅。参见苏智良、姚霏：《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记录》，学林出版社，2020年，第112页。

⑤ 该处为回字形的两层砖木结构房屋。参见苏智良、姚霏：《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记录》，第349页。

⑥ 参见《上海机器工会成立记》，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133页。

⑦ 参见黄雄：《一个工人的觉悟》，《劳动界》第11册，1920年11月23日，第3页。

⑧ 参见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页。

⑨ 参见《中共上海党志》编委会编：《中共上海党志》，第9页。

⑩ 参见《上海印刷工会成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134页。

⑪ 参见《上海劳动界的趋势》，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178页。

⑫ 参见陈秀萍：《俞秀松评传》，第45—46页。

组织活动。”^① 早期党员尝试成立小沙渡纺织工会，但成效不佳。^② 可以看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将工作重点放在动员印刷、烟草、纺织、机器等重要产业的工人上，他们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且以上产业多由外国资本家举办，工人所遭受的政治压迫更重。中共上海早期组织首先将斗争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有很强的反帝指向。

二 创办工人读物与工人半日学校

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是上海早期党员动员工人的重要途经之一，可以借此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劳动知识。具体而言，创办通俗性的工人读物与举办工人补习学校是早期党员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的主要手段。其中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尝试利用报刊对工人进行政治宣传，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创办全新的劳动者通俗读物——《劳动界》；二是改造《新青年》杂志或创办《共产党》月刊，使之成为党的机关（或理论）刊物。

1920年8月15日，上海早期党员创办了直接面向工人的通俗性读物《劳动界》，陈独秀任主编，主要撰稿人是沈玄庐、李达、陈望道等早期党员，该报每周出版1册，主要介绍国内外劳动界的动态，另设有读者投稿、演说、诗歌和小说等专栏。^③ 《劳动界》由新青年社印刷发行，主要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劳动知识，共计出刊24册，于1921年1月停刊。^④ 据维经斯基称：8月间我们出版了《劳动界》创刊号，每期印刷2000册，“由我们出版部印刷厂承印”。^⑤ 李汉俊在发刊词中提到了《劳动界》的办刊宗旨：我们有意让中国工人知悉应该懂得的事情，将来受的苦或许要比今天少一些。^⑥ 《劳动界》是早期党员创办的第一份指导工人运动的通俗性读物。

早期党员在《劳动界》发表了大量通俗易懂且有感染力的评论性文章。8月22日，陈望道在文章中描述了工人无所保障的生活惨状，提到工人“做得不动了，不够一家吃，东家也要回罢我们；做得太动了，也许生痲病，没有钱医治，只得等着死”^⑦。同日，李汉俊指出，工人和农民并不了解工钱是代表劳动力的，也不明白多付出劳动力就要多拿工钱，使得资本家“把我们劳力做出来的钱拿走了”。^⑧ 早期党员用朴实无华的语言、通俗易懂的案例描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现象和本质。同时，早期党员积极向工人宣传社会主义理想。10月31日，沈玄庐在文章中介绍社会主义的内容，指出：所谓社会主义，也就是人尽其能，做出对人类有益的东西，并“得到各自需要的均等的享用”。^⑨ 11月28日，李达在文章中解

① 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1953年7、9月），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2册，第304页。

② 参见《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节录）》（1955年8月2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184页。

③ 参见王晓岚：《〈劳动界〉栏目设置研究》，《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2014年第1期。

④ 参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5页。

⑤ 《维经斯基在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192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2页。

⑥ 参见李汉俊：《为什么要印这个报？》，《劳动界》第1册，1920年8月15日，第2页。

⑦ 陈望道：《平安》，《劳动界》第2册，1920年8月22日，第2页。

⑧ 李汉俊：《金钱和劳动》，《劳动界》第2册，1920年8月22日，第3页。

⑨ 沈玄庐：《什么叫做“非社会主义”？》，《劳动界》第12册，1920年10月31日，第1页。

释劳动者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提到如果能让劳动者免除挨冻挨饿的悲惨境遇，避免遭受资本家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最大的根本解决办法，就是社会主义”^①。《劳动界》用深入浅出且生动活泼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劳动知识，使得文化水平较低的工人更容易读懂和接受。

店员亦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且人数众多，是早期党员较早关注的劳动者群体之一。陈独秀认为：从广义上来说，凡是拿月薪且是雇佣性质的劳动者都应属于劳动阶级，商店的店员和交通工人、工矿工人是劳动团体的三大组成部分，可以组成一个大的劳动团体。^②上海工商业发达，店员人数众多且具备一定文化知识，比较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上海工商友谊会是较早组织店员群体的团体，其于1920年六七月份开始筹备，由失业店员出身的童理璋任理事长。^③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后，早期党员即筹划创办一份面向店员的通俗读物。9月5日，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以新青年社的名义在《劳动界》登出一则“特别启事”，称有意联合商店店员发行《上海店员》周刊，并愿意援助出版。^④童理璋等人得知该消息后，工商友谊会筹备会立即开会讨论与陈独秀（新青年社编辑的身份）等人合作办刊，并向新青年社致函咨询。^⑤9月26日，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等人邀请工商友谊会代表到外国语学社面商。^⑥双方商定由新青年社负担印刷费用和编排工作，上海工商友谊会负责稿件和代销工作。^⑦10月10日，在新青年社的帮助下，上海工商友谊会创办了店员通俗读物《上海伙友》。^⑧陈独秀在发刊词中指出：虽然商店的店员知识水平要比工矿工人、交通工人高得多，但广大店员“无法改良他们的境遇”，“苦恼更甚”，发行《上海伙友》主要目的是一是伙友诉说现在的苦恼，二是“研究伙友们将来的职务”^⑨。不过，由于双方思想追求、办刊宗旨存在较大差异，两者合作创办《上海伙友》前6册后即告中断，合作时间并不长。^⑩

中共上海早期组织还改版或创办了机关（或理论）刊物。《新青年》自1920年9月1日全新改版后，报刊风格发生较大变化，基本转变为倡导马克思主义的红色报刊，特设俄罗斯研究栏目“开展社会主义讨论”，成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理论刊物。^⑪《新青年》的受众群体广泛涵盖共产主义者、青年学生和社会名流，甚至影响到工人群体，凭借较高的社会知晓度，在全国各地拥有大量读者，销售量达10000余份，在全国的销售处近百家。^⑫《共产党》月刊于1920年

① 李达：《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劳动界》第16册，1920年11月28日，第1、2页。

② 参见《〈伙友〉发刊词》（1920年10月10日），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2册，第26页。

③ 参见陈彩琴：《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与〈上海伙友〉周刊》，《上海党史与党建》2020年第9期。

④ 参见《本社特别启事》，《劳动界》第4册，1920年9月5日，第3页。

⑤ 参见陈彩琴：《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与〈上海伙友〉周刊》，《上海党史与党建》2020年第9期。

⑥ 参见《俞秀松、李汉俊、陈独秀为筹办〈店员周刊〉写的信》，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106页。

⑦ 参见陈彩琴：《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与〈上海伙友〉周刊》，《上海党史与党建》2020年第9期。

⑧ 《上海伙友》编辑部遗址位于今山东中路2号附近（原金陵街美伦里12号），原建筑已不存。参见苏智良、姚霏：《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记录》，第249页。

⑨ 《〈伙友〉发刊词》（1920年10月10日），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2册，第26页。

⑩ 参见朱英、巴杰：《〈上海伙友〉论述——兼及店员之生存状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2期。

⑪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31页。

⑫ 参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7页。

11月7日在上海出版,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内部机关刊物,秘密发行。^①《共产党》月刊的办刊定位即是宣传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刊登苏俄、共产国际的消息以及各国工运的动态。^②《共产党》月刊的受众群体主要是共产主义者及青年学生,但对工人的影响比较有限。据李达回忆,《共产党》月刊“当时是秘密发行,所以影响不大”^③。

新青年社成立于1920年9月,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领导下最早的出版发行机构,由陈独秀负责,《新青年》《共产党》《劳动界》《上海伙友》起初都是由新青年社出版发行,还翻译出版“新青年丛书”等进步读物。^④以上报刊的不少材料是由共产国际代表从苏俄转运过来的。在维经斯基看来,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可以利用公开且合法的通讯社为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报纸提供服务。^⑤当时早期党员创办的机关刊物和工人通俗读物深受俄共(布)的影响。

在“五四”运动前后,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开始关注工人教育问题,并形成了一些颇有见解的认知和思考。1919年2月,李大钊发表《劳动教育问题》,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工人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我们国民“知识贫弱”,国家“教育不昌”,工人补助教育机关显得十分重要。^⑥中共建党之前,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引导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尝试开展工人教育,相继在多个地方成立工人补习性质的业余学校。其中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开办沪西工人半日学校^⑦,对工人进行劳动教育。由于上海工人整体文化水平不高,对其开展劳动教育显得十分重要。时人指出,“如今的工人,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只晓得做死工,还不求点精神上的快乐”,“我们工人想要发展自己的本能(领)。非受教育不行”,即“要入义务学校,星期学校”。^⑧李启汉在创办工人半日学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启汉,生于湖南省江华县,曾在长沙岳云中学求学,其间结识了毛泽东、邓中夏等人。1920年1月,李启汉追随毛泽东等人领导的驱张(敬尧)请愿团到北京请愿,曾住在求学于北京大学的邓中夏的宿舍。4月、5月份,李启汉在邓中夏的鼓励下来到上海,并于8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入党),

① 据施复亮追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一开始就叫‘共产党’,它的机关刊物也叫‘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1979年,第91页。袁振英也认为,《共产党》月刊“实际上是上海共产党小组的机关刊物”。包惠僧甚至认为,“11月7日出版《共产党》月刊,它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机关刊物”。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第114、117页。

② 参见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2册,第8页。

③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校内用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1979年,第66页。

④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34页。

⑤ 参见《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摘录)》(1920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1页。

⑥ 参见《劳动教育问题》(1919年2月14日、15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09页。

⑦ 沪西工人半日学校原位于沪西棕榈路锦绣里3号(今安远路62弄锦绣里178—180号)的简陋两层砖木工房内。参见苏智良、姚霏:《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记录》,第111页。

⑧ 工人量澄:《工人应该觉悟的地方》,《劳动界》第16册,1920年11月28日,第7、8、9页。

很快融入上海社会中。^①据许之桢回忆：李启汉负责工会活动，他很聪明，到上海后不久就学会了上海话。^②

1920年11月7日，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派李启汉等人在沪西安远路锦绣里（今安远路62弄）主持开办工人半日学校，这是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后又设立了工人俱乐部、游艺室等，对工人进行“革命启蒙教育”^③。不过，由于知识分子出身的李启汉等人缺乏工运经验，与工人隔膜较深，且工人做工繁忙，起初工人学员很少，甚至一度无法维持，于12月“被迫停办”。^④12月19日，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在此基础上成立上海工人游艺会^⑤，休闲娱乐性更强，以此来吸引工人加入工人半日学校。杨明斋、沈玄庐、邵力子到会演说，他们指出，从前工人之所以没有阶级觉悟，是被封建迷信所误导，我们要破除这些不利因素。李启汉以大会主席的身份强调：我们要通过工人游艺会的形式改革和打破“金钱万能”“劳工无能”的思想。^⑥经过此番宣传之后，工人半日学校得以于1921年春重新开学，工人报名人数有所增加。^⑦

同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也举办了类似的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1月1日，北京早期党员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成为其接近工人的重要途经。^⑧就教学内容而言，劳动补习学校的教员向工人讲授文化知识和劳动知识，并“不断地向他们指出组织起来的意义和方法”，介绍马克思主义。^⑨劳动补习学校的开办对提高工人的劳动知识和阶级觉悟有重要意义。据邓中夏回忆，虽然小沙渡工人半日学校的影响力不及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大，但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意义重大，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起点”。^⑩此外，上海机器工会也开办了英文义务夜校，主要是“培养工人之道德智识”。^⑪夜校规定不论是否已入会的工人，均可以报名入学，每月收取一定津贴，每晚授课两个小时，“科目注重实用”。^⑫

三 支援罢工与组织集会

早期党员对工人罢工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在他们眼里，发动工人罢工的重要动因是帮助劳

① 参见吕芳文：《李启汉》，《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4期。

② 参见许之桢：《关于新渔阳里六号的活动情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199页。

③ 上海市普陀区志编纂委员会编：《普陀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④ 参见上海市普陀区志编纂委员会编：《普陀区志》，另见吕芳文：《李启汉》，《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4期。

⑤ 上海工人游艺会成立大会旧址位于白克路207号上海公学（今凤阳路186号）。参见苏智良、姚霏：《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记录》，第349页。

⑥ 参见《上海工人游艺会成立大会记》（节录），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138页。

⑦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38页。

⑧ 参见《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231页。

⑨ 参见《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232页。

⑩ 参见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节录）》（1930年6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308页。

⑪ 参见《机器工会演戏兴学再志》，《民国日报》（上海）1921年3月19日，第11版。

⑫ 参见《机器工人补习英文机会》，《民国日报》（上海）1921年12月19日，第11版。

动者改善悲惨的生存境遇。1920年9月5日，陈独秀提到，在中国开展工人运动并不是简单地跟着外国的“新思潮凑热闹”，亦不是“高谈”社会主义，主要是通过工人运动唤起大家的同情心和对待同胞的感情，以此“来帮助贫苦的劳动者”。^①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组织集会和支援罢工的重要目的是反对资本家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11月，罢工问题被写进由陈独秀等人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即革命的阶级工会要用罢工的方法不断“扰乱资本家的国家”，使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日趋软弱”。^②也有人对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倡导的工人罢工提出反对意见，身为国民党元老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戴季陶认为：如果真正为劳动者着想，就应该暂时放弃用政治罢工的形式动员工人，因为对上海的劳动者而言，政治罢工“实在感触（没）什么必要”。^③因为戴季陶反对工人罢工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很快从共产主义者阵营中退出，使得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出现了分化。

其实，不仅早期共产主义者内部对工人罢工出现过反对声音，就连普通民众也提出过异议。对此，早期党员对倡导工人罢工的原因作了详细的解释。1920年12月1日，陈独秀对时人提出的质疑作出正面回应称，提倡劳工神圣与发动工人罢工并不相悖，之所以提倡工人罢工和减少工作时间，原因在于现行的生产制度沾污了“劳工神圣”。^④也有一些早期党员在支持工人罢工的同时，又对工人罢工的实际作用持保留态度，其中李达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他提出，虽然劳动运动是“社会运动最大的武器”，但是劳动运动只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如果仅仅依靠劳动运动，是“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原因在于实行总罢工要求劳动者有“相当的教育和训练不可”，劳动运动只是社会运动的一个必要手段，而非唯一手段。^⑤也有人认为工人罢工只能在得到军队的支持下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施存统持此观点，他表示：“我以为总同盟罢工，只有得着军队底援助，才能成功社会革命。”^⑥

应该说，早期党员对工人罢工的作用有不同的认识 and 解读。有人提出工人罢工有利于社会改革和国家富强。1920年年底，李大钊发文指出，各国罢工风潮及群众运动颇为“壮烈”，我们既要注意“团体的训练”，也要鼓励民众运动和社会改革，只有这样，中国“才会有点希望”。^⑦有人分析了工人罢工的不同形式和成效。12月7日，李达提出：“工会运动的武器就是同盟罢工”，但同盟罢工的性质可分为经济、政治、社会3种，政治同盟罢工是劳动者利用产业工人的地位在政治上实现一定的目的，如扩大选举权等；经济同盟罢工的目的在于增加劳动待遇或减少劳动时间；社会同盟罢工的目标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进而创建社会主义制度。^⑧相形之下，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倡导的劳动运动与工团主义派的主张有很大的区别。李达认为工团主义主要依

① 参见陈独秀：《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劳动界》第4册，1920年9月5日，第2页。

② 参见《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0月），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1册，第3页。

③ 参见陈独秀：《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劳动界》第15册，1920年11月21日，第1、2页。

④ 参见《随感录》（1920年12月1日），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2册，第92页。

⑤ 参见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疑梁任公》，《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第1、2页。

⑥ 参见施存统：《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1921年5月16日），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1册，第283页。

⑦ 参见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1921年3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3册，第348页。

⑧ 参见李达：《社会革命底商榷》（1920年12月7日），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1—182页。

赖同盟罢工的武器，该斗争方式只适合于工业国，而中国和俄国同属于农业国，所以中国的革命运动可以模仿俄国，即“采用劳农主义”。^①早期党员对工人罢工的认识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并深受苏俄的影响。

由于上海的物价不断上涨，工人温饱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上海的工人罢工时有发生。受俄共（布）派遣来华的刘江写道：“上海的生活费用比和平时期增加百分之几，而工资相反却在减少，因此有组织的罢工频繁发生。”^②早期党员对上海工人罢工予以声援和支持。1920年9月19日，陈独秀曾对三新纱厂的罢工予以公开声援，他在《劳动界》发表的《无理的要求》一文中指出，三新纱厂的工人因为上海物价昂贵已难以糊口，而资本家还要减少工人人工钱，纱厂工人自然要起身反抗。^③虽然陈独秀的声援并不能左右工人罢工的成败，却对这一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再如，同年年底，由于上海法租界电车公司的工人“因为生活程度日高，所得工钱不够维持生命”，经过几次交涉后，公司最终没有答应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1921年3月3日，上海法租界电车工人举行罢工，最终公司答应了工人的要求，工人于3月7日复工。^④其间，早期党员对上海法租界电车工人罢工给予了声援。李汉俊接连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抨击资本家和支持工人的评论文章，为罢工的胜利营造了有利的舆论氛围。3月5日，李汉俊在文章中指出，“电车是社会用惯的交通器具，上海又是交通频繁的地方，一般人因此感受的痛苦很大，当然更有深切感想”，“世界常有的劳动运动早就到中国来了，这般人底迷梦也应该醒了”。^⑤3月8日，李汉俊再次撰文指出：“中国既然有了这罢工事件底发生的条件，诸君又为这事叫受了痛苦，诸君为自己安宁计就应该把从前曾经漠视的劳动问题，拿来好好研究了。”^⑥由于早期党员多为知识分子，通过评论性文章声援和支持罢工成为比较常见的方式。

早期党员还通过领导群众集会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其中不少宣传活动是利用重要的纪念日开展，比如纪念五一劳动节等。^⑦当然，早期党员举行这些集会并非是自己独立举办，时常要联合商界、学界共同举办。据早期党员邵力子回忆，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员时常到学生中间演讲，也会派邵力子等人通过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联络商人，并及时向党组织报告。^⑧1921年4月17日，中共上海早期组织邀请工界商讨“五一”节工人集会，成立了“纪念劳动节筹备委员会”，李启汉分别邀请中华工业协会、工商友谊会、机器工会等团体代表参会。筹备委员会还向上海各商会、学校、报馆等机关团体发出了庆祝五一的通知，计划在5月1

① 参见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疑梁任公》，《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第1、2页。

② 《刘江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1920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5页。

③ 参见陈独秀：《无理的要求》，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103页。

④ 参见李汉俊：《法租界电车罢工给我们的教训》，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41页。

⑤ 李汉俊：《我对于罢工问题的感想》，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139—140页。

⑥ 李汉俊：《法租界电车罢工给我们的教训》，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143页。

⑦ 参见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本社编：《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28页。

⑧ 参见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节录）》（1961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191页。

日当天组织全市工人停工，并计划在上海公共体育场召开纪念大会。在4月29日，法租界巡捕房搜查了渔阳里6号，并严令禁止工人在五一当天举行集会和游行。^①不过，在五一当天李启汉等人还是领导少数工人在沪西、闸北散发了传单。^②据包惠僧回忆，五一劳动节当天在上海天后宫举行了群众集会，在报刊上发表了若干宣传文章，并散发了宣传单，虽然没有动员广大群众参加，但在中国举行五一劳动节的纪念活动，“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③另据许之桢回忆，在渔阳里6号筹备了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工作，“印了四五万张传单”，在五一劳动节当天，我们把传单拿到闸北、天后宫和永安公司等处散发。^④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开始尝试利用联合战线的组织模式，与商界、学界共同举行群众集会，意图将工人和其他阶层组织动员起来。

四 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动员工人的影响

应该说，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对工人的政治动员取得了一定成效，早期党员通过多种渠道接近工人，与工人建立一些业务联系和人情交往，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奠定了较好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并营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⑤

第一，通过组织上海机器工会等群众性的阶级工会，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较好的群众基础。在早期党员的宣传动员下，部分工人认识到成立阶级工会的重要性。一位化名为量澄的工人表示：“我们工人吃的饭，要自己吃，不必要别人来喂；穿的衣，要自己穿，不是要别人替我们来穿的。衣食既是自身的利害，那就要组织工会。”^⑥在中共上海早期组织领导下成立的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具有明显的群众性、阶级性和民主性特点，是拥有群众基础的阶级工会。邓中夏称，在中国直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才有了现代式的工会，至此工会才逐渐“具有组织性、阶级性以至于国际性”。^⑦这时的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已初步具备了改善工人生活条件、提高工人阶级觉悟、领导工人进行阶级斗争的职能。诚如施存统所言，工会有两种作用，其一是谋求劳动者生活的改善，与资本家进行斗争；其二是对劳动者进行组织训练，准备以后管理国家生产事业。^⑧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间进一步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较好的思想基础。中共上海早期组织通过创办《劳动界》等面向劳动者的通俗读物，开办工人半日学校，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间进一步传播，工人的阶级觉悟有所提高。早期党员在《劳动界》上发表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文章，其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呈现给劳动者

① 参见《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综述》，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42页。

② 参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第23页。

③ 参见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1953年7月、9月），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4页。

④ 参见许之桢：《关于新渔阳里六号的活动情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198页。

⑤ 参见《中共上海党志》编委会编：《中共上海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页。

⑥ 工人量澄：《工人应该觉悟的地方》，《劳动界》第16册，1920年11月28日，第7、8、9页。

⑦ 《邓中夏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1930年6月），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9页。

⑧ 参见施存统：《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1921年5月16日），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1册，第282页。

面前，受到不少工人的关注和追捧。1920年9月3日，陈文焕在给陈独秀的信中称：我们工人“多欢喜”你们创办的《劳动界》刊物，原因在于至此我们工人可以开口讲话了，可以伸冤了，该刊成了“工人的喉舌”和拯救“工人的明星”。^①在此情况下，不少工人在《劳动界》的感召下，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觉悟有了一定提高。一名为朱信庸的读者致信陈独秀称：阅读了你们的文章“实在佩服”，改良劳动阶级的悲惨境遇和觉悟资本家的思想，并不是两三个人的责任，“大凡有这个能力的人，都应该尽力去做”。^②经过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宣传动员，一些工人开始率先觉悟起来，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较好的思想基础。1921年5月11日，早期党员周佛海称，经过社会改造的思想和社会革命的行动，使“暮气沉沉的中国”出现了新的生机，现在的中国“如旭日东升一天天地高起来了”。^③

第三，领导工人集会和支援工人罢工，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营造了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随着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对工人展开多方面的政治宣传和组织动员，上海的工人罢工有所增加。时人指出，今年上海的工人团体与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工人的阶级觉悟有了提高，几乎每天可以听到“罢工的呼声”。^④这时上海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斗争有所高涨，甚至有人大胆预见，如果照此形势发展下去，在三五年内上海工人一定可以上演“打倒资本制度的事业”这一惊天行动。^⑤1921年2月，上海有轨电车工人通过罢工达到了增加工人工资的目的，一名参加过罢工的电车工人说，如果资本家继续停工，我们将邀请电力工人和水厂工人前来支援我们，使上海断水断电，陷入混乱，俞秀松等人得知该消息后称赞电车工人“已经有了阶级觉悟”，并已洞悉了资本家的策略。^⑥在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影响下，上海的工人集会和工人罢工有所增加，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创造了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

不过，还应看到的是，这时早期党员并没有真正领导上海工人开展罢工实践，亦没有动员更多工人参与其中，这无疑与中共上海早期组织自身力量弱小，组织涣散，且缺乏工运经验有关。早期党员邵力子回忆，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工作“以工人运动为主”，但由于在“这方面无基础”，所以起初“给工人演讲，听众还是很少的”。^⑦这时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尚处于初创阶段，其组织形态并不完备。由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人陈独秀一度在广州任职，其他主要成员也忙于本职工作，以致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并未过多从事实际工作。李达指出，李汉俊等早期党员“多忙于教书”，党组织的工作“没有已往那末（么）紧张”，有不少事务甚至“陷于停滞状态”。^⑧在此情况下，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的工会也难以避免地出现了运行困难的情况。据早期党员徐梅坤回忆，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过以英美烟厂印刷工人为主体的上海印刷工会，也开展过一些活动，但由于“无人具体负责，印刷工会实际上只是个名义而已”，上海

① 参见《通信》，《劳动界》第12册，1920年10月31日，第15页。

② 参见《通信》，《劳动界》第12册，1920年10月31日，第15页。

③ 参见周佛海：《夺取政权》（1921年5月11日），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1册，第250页。

④ 《上海劳动界的趋势》，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178页。

⑤ 《上海劳动界的趋势》，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178—179页。

⑥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第208页。

⑦ 参见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节录）》（1961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191页。

⑧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131页。

机器工会大体也是这样。^①早期党员为方便开展各项工作，甚至不得不与无政府主义者进行合作。据当时曾为新青年社负责印刷工作的郑佩刚回忆，早期党员创办的《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等工人刊物成为推动工人运动发展的“姊妹刊物”，但这几个刊物多是由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一起编辑的。^②显然，中共早期组织并没有完全摆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上海存在各种帮会、帮口、同乡会等传统势力，成为影响上海工人运动发展的因素。虽然上海工人的工资待遇不高，生活拮据，但相较于贫穷落后的农村而言，依然是周边省份农民一心向往的热土。马林指出：“尽管工作条件很苦，工业城市仍可以得到大量工人，因为贫苦农民大量流入城市。”^③问题是，从农村到上海做工的工人普遍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和传统意识，与乡村联系紧密，希望若干年后再回到农村的工人大有人在。马林解释道：上海的现代工业虽然受到外国工厂的刺激发展较快，但现代工业的工人数量却很少，产业工人在中国人口总数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直到现在，很多工人仍然与农村家庭保持着联系，并准备在上海做工几年后再返回乡村。^④

这时很多上海工人对群众性的阶级工会并不看好，更喜欢加入传统的帮会、帮口和同乡会，以此寻求心理慰藉和生活依靠。时人指出，上海情况“非常复杂，言语风俗感情，很不一致”，“帮既不同，感情亦异”，工人之间“互相排挤”的事情层出不穷，所以将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实是一件难能之事”。^⑤马林总结道，中国旧式的行会、工人组织、秘密团体，特别是上海的青帮、洪帮，“与其说是现代工人运动健康发展的帮助，勿宁说是障碍”。^⑥1921年春，赴俄的早期党员代表俞秀松等人在向青年共产国际报告时称：上海存在着特殊的保护工人利益的传统势力，即青帮和洪帮，这两个帮会在工人中间“享有声望”，同时保护偷盗者和普通工人，甚至得到上海当局和租界当局的默许，而帮口势力亦是如此，“要在这些劳动组织中废止这些倾向是非常困难的”。^⑦

同时，华界当局和租界当局对工人运动管控甚严。比如，上海机器工会甫一筹备就遭到北洋军阀的阻挠和破坏。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筹备后，身为淞沪护军使的何丰林立刻向北洋政府当局汇报称：马克思主义信仰者陈独秀来到上海后联合俄共（布）等政治力量“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创办“杂志鼓吹社会主义”。^⑧10月17日，上海机器工会理事会讨论了北洋当局的态度问题，并商讨了应对之策，认为本会只是由机器工人组成，“宗旨在联络感情，目的则在减轻痛

① 参见徐梅坤：《九旬忆旧——徐梅坤生平自述》，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5页。

② 参见《郑佩刚的回忆》（1964年2—5月），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2册，第484页。

③ 《马林给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1年7月11日），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1册，第420页。

④ 参见《马林给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1年7月11日），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1册，第421页。

⑤ 《上海劳动界的趋势》，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178页。

⑥ 参见《马林给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1年7月11日），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1册，第420页。

⑦ 参见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第206—207页。

⑧ 《淞沪护军使向北洋政府发电指责陈独秀组织机器工会》，《申报》1920年10月16日，第10版。

苦”，与普通的学会、农会并无二致。^① 10月20日，李中等人在《申报》上发文申明：根据本会的章程规定，非机器工人不得成为本会会员，所以上海机器工会是由李中等人组织的。^② 此外，租界当局对早期党员领导的工人集会持反对态度。如1921年的“五一”劳动节的集会就被租界当局蓄意破坏，法租界巡捕房派了武装巡捕搜查了渔阳里六号。^③ 由此可见，华界当局、租界当局对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立群众性的阶级工会和领导罢工集会持反对态度，并设法进行打压和破坏。

结 语

综上所述，中共上海早期组织通过安排或培养共产主义者入厂做工，作为接近工人、动员工人的重要渠道，以此影响并团结周围的工人群众，先后成立了拥有一定群众基础的阶级工会。同时，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出版面向工人群众的《劳动界》等通俗读物，并创办小沙渡工人半日学校，以此对工人进行政治宣传和劳动教育。此外，中共上海早期组织还发动工人举行各种集会，并支援工人罢工，以此反抗资本家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中共上海早期组织通过多种渠道对工人进行政治动员，促使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上海工人中间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的结合^④，工人的劳动知识和阶级觉悟都得到一定的提高，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较好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并营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不过，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由于自身力量弱小，组织涣散，经验缺乏，且面临租界、华界（军阀）和传统势力的多方压制，其对工人的动员更多停留在有限的组织建设和宣传教育层面上，并没有真正领导工人开展罢工实践，尚处于阶级启蒙阶段。1921年7月11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指出：虽然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却没有在那里出现我们“熟悉”的工运高潮。^⑤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① 参见《机器工会理事会纪（节录）》，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第121页。

② 参见《上海机器工会来函》，《申报》1920年10月20日，第11版。

③ 参见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1953年7、9月），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2册，第304页。

④ 参见《中共上海党史》编委会编：《中共上海党史》，第1页。

⑤ 参见《马林给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1年7月11日），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1册，第420页。